

第三网络社会与新“差序格局”

李斌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汉语中的“网络社会”实际上可指代三种形态——关系社会、赛伯社会和网络社会。关系社会由零散的强关系簇构成,赛伯社会是以技术为中轴的虚拟空间。当赛伯社会作为一种外力介入关系社会后,网络的“内卷”和“外张”共同促生了第三网络社会。这种社会的微观关系结构是新“差序格局”。最后,“差序格局”的转变被笔者用来作为一种解决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分歧的文化视角。

关键词:关系社会;赛伯社会;第三网络社会;内卷;外张;新“差序格局”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06)05-0057-04

The Third Network Society and New “Different Relationship Pattern”

LI B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Abstract: The Chinese phrase “Wang Luo She Hui”(Network society) virtually re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forms——Tie Society, Cyber Society and Network Society. Tie society consists of scattered strong-tie clusters, and cyber society is invented space which features of technology axis. When the cyber society intervene the tie society as external force, the process of “involvement” and “extension” promote the birth of third network mutually, whose micro-structure is new “different relationship pattern”. At last, the author u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fferent relationship pattern” as an explanatory perspectives for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Bian Yanjie and Granovetter.

Key words: tie society; cyber-society; the third network society; involvement; extension; new “different relationship pattern”

与其说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倒不如说重大事件产生一代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谬带来了达达主义,“9.11”的疯狂催生了恐怖主义的甚嚣尘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足以改变文化状态和社会结构的重大事件中,技术革命毫无疑问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原子弹的出现给了我们摇滚乐和科幻小说,伴随电视机的产生是媒介革命,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告诉我们网络社会的崛起^{[1](P369)}才真正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有这种想法的还有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这些天才的预言家们,只不过前两人

喜欢用“数字化生存”^{[2](P21)}和“信息社会”^{[3](P17)}来形容这场文化或结构转型的结果,琼斯却愿意宣称一种以计算机为中介(“computer-mediated”^{[4](P1)})的赛伯社会(cyber-society)的来临。尽管表述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一种新型社会已经来临或正在生成。不过,当我们按照卡斯特的思路把这种新社会表述为“网络社会”的时候,语言的僵化和凝固在此显露无遗。汉语中的“网络社会”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概念,笔者认为实际上它包括三种可分辨的形态,依照发生的顺序分别为关系社会、赛伯社会和网络社会。三种网络社会分界的最有效标志是以计算机和因特网发展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进步。作为

收稿日期:2005-12-20

作者简介:李斌(1983-),男,汉族,安徽池州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一种介入性的力量，计算机在很大程度上重组了社会的关系结构。

一、关系社会与赛伯社会：“零碎”与“虚拟”

网络往往被定义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由带着一定资源的行动者和关系构成。”^{[9](P16)}需要补充的是，资源必须是异质性的，带有同质性资源的行动者之间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网络。依此定义，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行动者并不寄寓交换的方式获取资源（这并不排除可能存在些少的非经济动机），构成网络的关系路径无法产生，网络也就很难形成了。真正的网络是伴随交换和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由此而生成的“网络社会”形态被笔者称为第一网络社会。但这种意义上的网络是包含分层和区隔的，各个层级和区隔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互动方式，而表现为断裂，呈现的是一种“网状隔离”。^{[9](P137)}所以第一网络社会实质上是由众多有着边界的网络簇构成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结构意义的网络。零碎的网络簇之间缺乏制度化的互动方式，只有偶生的个别的关系存在。因此，笔者也把第一网络社会称为“关系社会”，意在突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单位——“关系”。第一网络社会中，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关于关系的“强—弱”划分是可以立足的，在关系簇内部形成的是强关系网络，它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而在关系簇之间存在的是弱关系，并且弱关系的维持需要制度保证。可见，这种社会的整合并不是依靠弱关系的连接，而是一种强力机构主导下的“马铃薯整合”方式。

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的交往形式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 F2F 交往（face-to-face communication）之外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CMC 交往（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进而出现了两种具有不同中轴的社会形式，一般意义上我们把基于 F2F 交往的社会称为现实社会，而把基于 CMC 交往的社会称为“网络社会”。这里的“网络社会”就是第二网络社会，笔者根据其英文单词 cyber-society 将其音译为赛伯社会。赛伯社会不是生成性的，而是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突生性关系结构，建构于由众多的具有独立功能的计算机站点按一定协议交叉互联组成的物理关系平台之上。这是一个全新的空间，不受领土和司法限制，有着自己的结构特性：（1）虚拟性。在网络空间中，人是隐藏的、匿名的，表现的是“虚拟我”或“隐体我”。身份、思想与身体的映射关系在互联网中是断裂的。威廉·S·吉布林（William.S.Gibson）将身体比喻为“肉（meat）”，认为只要技术上可能，使得思想可以脱离肉体而植入网络，身体就会像肉一样腐败无用。^{[7](P57)}另外，网络空间本身也是虚拟的。“与人类的具有实体性和可感知性的一般社会行为不同，网络交往行为只存在于以数字化的形式而存在的信息关系结构

中，它既不依附于一般的社会行为所必需依附的特定物理实体或时空位置，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或能量流动的过程中，而是奠基在以光速运动的比特及其特殊的数字化运动组合方式或过程之中。”^{[9](P32)}一旦进入到互连网络之中，人们参与的就是一种“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2）“后台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用“剧场”形象地比喻人类互动的场所。“前台”（frontstage）和“后台”（backstage）是两种分离的表演状态，前台是剧本实现（dramatic realization）的地方——个体的表演是理想化的，展示的是美好的一面；后台是休息的地方，剧组成员是自由的。在赛伯社会中，人们基于一种“无焦点互动”，所有的表演都是非可视的，所以人们虽然处于一种角色扮演状态，但这种扮演却可以是伪装的，不具有前台性。（3）民主性。互联网的技术思想在创造生产力、释放身体压迫力的同时，也创造出民主和平等。在因特网中没有中央集权控制，而是具有反集权的分散性。无论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是无法控制这个网络的。（4）时间的伸延性和空间的压缩性。当人们处于面对面互动状态之中，互动主体是“共同在场”（co-presence）的，交流受身体（body）、地点（place）、场所（locale）或者“情境”（situation）的约束，所有的互动遵循时空规则。而当技术中介（如电话、电子计算机、手机等）出现后，互动可以以“不在场”（absent）的形式取得时，时空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空间趋于无意义，时间却被拉伸。

赛伯社会内部不是分裂的，“互联”形象地描绘了空间内部的关系结构。一般来说，技术使赛伯社会成为可能，但附着于技术之上的是流动的关系，参与网络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可到达的，从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网络。

二、第三网络社会：“内卷”与“外张”

第三网络社会才是卡斯特意义上的网络社会，它不同于前两种，但又是第一网络社会的基础上依靠第二网络社会的介入才最终发展起来的。“网络内卷”和“网络外张”是伴随介入发生的，但同时也是它的结果。

“内卷化”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维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文化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1963年，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过程》中描述爪哇岛的生态变迁过程中再次使用了“内卷化”这个概念，他用“农业内卷化”来说明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使得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以至于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

稻生产中。^{[9](P97)}因此“内卷”与“外延”或者说与“外张”是两个相对性的概念,“内卷”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外张”受到条件性障碍。那么,“网络内卷”与“网络外张”又是如何统一的呢?

实际上“网络内卷”是针对关系社会中的网络簇(强关系)而言的。因为第三网络社会是内生于关系社会的,因此网络簇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强关系圈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一系列有意义的分割标准并未丢失,但同时它也不可能得到扩张。笔者把“网络内卷”界定为网络簇内部由于受到赛伯交往影响呈现的复杂化、信息异质化的过程或结果。它由如下的一些现象构成:(1)赛伯网络中的民主气氛影响到现实中人们对境遇的反思。正如卡斯特所说:“社会变迁也与技术与经济转变的过程一样剧烈。……但家长制已然受到攻击……”。^{[1](P3)}从最微观的家庭到中观的组织到宏观的国家,有意义的网络簇形式都已经受到内部结构调整的压力。(2)由于信息获得方式多样化以及信息更新速度的加快,强关系圈中个体的资源和知识差异化明显,强关系内部的桥梁构建成为可能。“文化反哺”和“后喻文化”成为知识更新的重要渠道。

“网络外张”在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产生后成为可能,个人的弱关系边界扩大,人们可以与网络中的任何人生成关系,现实社会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关系簇或普遍网络。这是可证实的,在判断簇的数学定义中,只有当联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度最低不低于某个标准(即 $\text{minimum}(Z_{ij}, Z_{ji}) >$),簇才成立。鲁斯(R.D.Ruce)在定义N-簇时提出的

标准是 $=1/(n+1)$,也就是说在N-簇中,所有的行动者都以n步或小于n步的距离到达对方。^{[5](P43)}

“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证明了第三网络社会是6簇的。该理论也称“小世界现象”(Small World Phenomenon),是美国社会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提出来的。他认为,随着世界联系的增大,世界本身却变得越来越小,小到“只要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联系到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为了在更大范围内验证这一理论,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博士领导的“小世界研究计划”(Small World Research Project,简称SWRP)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詹姆斯·穆迪(James Moody)博士领导的“电子小世界计划”(Electronic Small World Project)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电子邮件的方法来进行实验。前期的实验结果证明该理论是可信的。实验很恰当地证明了当今世界是6簇的,而且通过实验手段(“电子邮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正是第二网络社会的介入才引起了这种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第三网络社会与前两种网络社会的最大差别之处在于,第三网络社会中作为结构

的网络已经形成,它从各个方面再结构着社会。而在第一网络社会,网络只是零散的,它只是有限度的为个人提供资源和价值观;在第二网络社会,网络本身是虚拟的,是以技术为中轴构建的虚拟空间,尚不足以形成结构力。而当以网络作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发展演绎着社会系统重塑的逻辑时,这种逻辑本身也同时宣告卡氏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即第三网络社会的来临。

三、新“差序格局”与“强—弱”关系的流变

在第一网络社会(关系社会)中,中国社会的微观关系结构是费孝通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差序格局”。他认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像是石子扔进水中形成的一圈圈外推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圈子的中心,每一圈都是远近亲疏不同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圈层”,并且一人形成的社会关系圈层不同于另一人。他说:“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0](P26)}这是一种先赋性的“差序格局”,任何人一出生,就形成了自己的格局图,并且自然地落在他人格局图中的某个位置。每个人的格局图都是稳定的,也是独特的。从内层往外,关系由强至弱,个人负载的义务由高到低。

到了第三网络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正逐渐被一种新的“差序格局”所替代。新“差序格局”是一种自致性的格局,是个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努力获得并维持的一整套关系结构。“新”并不是指形式上的新,实际上它有着和传统“差序格局”一样的构造和肌理,而是指实质和内容上的新,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首先,决定差序的标准有别。传统“差序格局”是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往外“推”的依据。“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形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在乡土社会,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如此。”^{[10](P26)}到了第三网络社会,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降低,一种基于业缘和友缘的“差序格局”逐渐生成,即新“差序格局”。最好的朋友在第一圈,朋友的朋友在第二圈,如此类推。传统的亲缘和地缘是一种先赋属性,而现在的业缘和友缘则是一种自致属性,因此“差序格局”的变迁体现的是一种现代化的道路。其次,“差序格局”圈层中的组成也不同。因为差序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差序圈层中的构成也是分异的。第三,虽然在理论中,传统的“差序格局”是具有伸缩性的,可以无限往外推以至无穷,但是实际上由于多种因素(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制约,个人能调动的关系往往是前几层的,

越往后其功能性呈级数递减。但在新“差序格局”中,根据“六度分离”理论,平均的圈层为6,是一种有限的“差序格局”,而且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还使得空间距离趋于无意义,从而扩大了可调动社会资本的空间和范围。第四,新“差序格局”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既体现在圈层间元素的移动(比如,某人可以把自己的“朋友的朋友”变为“朋友”),也包括圈层内的元素变动,而且任一圈层元素的变动都将影响到下一个圈层元素的变动。但传统的“差序格局”是相对稳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地缘关系网络是很难变动的。

由传统“差序格局”向新“差序格局”的演变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既是一种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转型。在笔者看来,这种转型正好可以被用来阐述“强—弱关系”的流变,并且作为解决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分歧的文化视角。1973年,《美国社会学杂志》第78期发表了格兰诺维特的著名论文《弱关系的力量》^{[11](P39)}在这篇论文中,格氏通过对关系强弱的界定,提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连接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群体之间的纽带。群体内部由于身份地位的相同性,导致信息的重叠;而由弱关系联系着不同的群体则掌握着不同的信息,弱关系充当着信息桥的作用。桥梁(bridge)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是不同群体间信息流通的关键。这就是所谓的“弱关系假设”。而在《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12](P50)}一文中,边燕杰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了与格氏截然不同的“强关系假设”。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同,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承担着桥梁的作用。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13](P1)}中,边燕杰认为,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求职在中国的计划体制下不是一个自由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情的强弱就会产生不同效果。

“弱关系”和“强关系”的对垒是用文化差异来解释的,这点边燕杰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阐释。笔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差异就是不同的“差序格局”所造成的。中国一直以来,是传统“差序格局”占主导地位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强关系”(亲缘和地缘)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是强调先赋性关系的重要性,并排斥“弱关系”。而新“差序格局”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特征,产生的是一种“弱关系”(业缘和友缘)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内涵是强调自致性关系的重要性。传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只有一套“差序格局”的,一种文化的惯性使得他们习惯于调动自己的强关系,虽然从格氏理论上“弱关系”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资源。但是,回归格氏理论是必然要发生的,这就是因为“差

序格局”的变迁。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两套“差序格局”,并且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自致性“差序格局”的逐渐增长和先赋性“差序格局”逐渐减弱的过程,所以伴随这个过程就是“强—弱关系”的流变,即从“强关系”过度到“弱关系”。人们不再依赖传统的“强关系”,也就是说不再习惯利用传统“差序格局”中蕴含的社会资本,而是更多地利用自致性网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弱关系”。“差序格局”的转变、“强—弱”关系的流变和现代化是伴生性关系,所以一个可预测到的事实就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包含着传统强关系的衰落和弱关系的兴起。

总之,作为“理想类型”的三种网络社会有着各自的关系属性,演绎着不同的生态方式。第三网络社会的崛起既是文化上的,也是结构上的,并且它们的合力促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关系模式。当然,所有的一切都缘于技术的进步。技术对结构的改造能力已经凸显并必将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 [1]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2]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3]奈斯比特.大趋势[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4]Steve Jones. Cybersociety: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M].C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 [5]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 [7]余红,杨伯淑.性别隐匿的赛伯空间[J].社会,2002,(10):57-59.
- [8]曾坚朋.虚拟与现实:对“网恋”现象的理论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2,(6):30-36.
- [9]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96-110.
- [1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1]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J].国外社会学,1998,(2).
- [12]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间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J].国外社会学,1998,(2).
- [13]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国外社会学,1999,(4).

责任编辑:俞宁